

培文书系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靳丛林 著

竹内好的 鲁迅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靳丛林 著

竹内好的 鲁迅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内好的鲁迅研究 / 靳丛林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2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ISBN 978-7-301-19864-3

I. ①竹… II. ①靳… III. ①鲁迅研究 IV. ①I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6600 号

书 名: 竹内好的鲁迅研究

著作责任者: 靳丛林 著

出品人: 高秀芹

责任编辑: 姜 贞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864-3 / I·241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印刷者: 三河市新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206 千字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绪 论	“竹内鲁迅”——难以逾越的高峰	1
第一章	竹内好与他的时代	21
第一节	竹内好的中国情结	21
第二节	毕业论文《郁达夫研究》	25
第三节	动荡岁月中的研究生涯	31
第二章	《鲁迅》的解读	45
第一节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与《鲁迅》的关联	45
第二节	《鲁迅》的框架内容	53
第三节	关于传记传说化	60
第四节	“回心”与挣扎	71
第五节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悖论	84
第六节	文学家与启蒙者	91
第三章	鲁迅作品的批评与解说	99
第一节	“竹内鲁迅”与鲁迅作品	99
第二节	小说批评与解说	119
第三节	散文、杂文批评与解说	146
第四节	《两地书》与《自嘲》诗解	161
终 章	凭借鲁迅的历史反思	167
第一节	“大东亚战争”与“自我”	168
第二节	日本文化的反省	180
参考文献	195
附录	竹内好年谱	201
后 记	248

绪论 “竹内鲁迅”——难以逾越的高峰

域外鲁迅研究，以东邻日本最盛，其中竹内好 20 世纪 40、50 年代对于鲁迅的研究（借鲁迅精神来反省日本的文化、亚洲文化乃至日本的战争），曾被日本学界视为难以逾越的高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的日本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丸山昇先生的《鲁迅·革命·历史》一书中，有一篇《日本的鲁迅研究》，是梳理日本鲁迅研究历史的，其中谈到日本评论社 1944 年 12 月出版的竹内好的《鲁迅》时，说它“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他以后的所有鲁迅研究者，都从这本书继承了很多东西。即便能够提出在各个方面异于竹内的鲁迅形象，也是通过坚持自己对‘竹内鲁迅’的不同意见、深入发掘差异之处才产生的自己的鲁迅形象，在这个意义上，依然处在竹内的强烈影响之下。”^①可见竹内好鲁迅研究影响的深广。

为了更好地理解竹内好的鲁迅研究，我们还是先来简要地回顾、梳理一下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并略述“竹内鲁迅”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以便于进一步认清“竹内鲁迅”的历史地位、价值、意义与深远影响。

一、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钩沉

这里着重梳理竹内好《鲁迅》出现之前的战前日本鲁迅研究。关于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情况，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国内有许多专论，此不赘述。

^① 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1 月，第 339 页。

1. 五四之前：早于中国之发现

日本的鲁迅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先于中国的鲁迅研究的。这是有事实作依据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上海留学时，在《复旦学报》1980 年 2 期上发表了《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一文，其中谈到他在浩如烟海的日本文献中发掘出来的 1909 年 5 月 1 日东京出版的杂志《日本与日本人》508 期“文艺杂事”栏所载有关周氏兄弟的文字：

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按，日本地名，东京大学一带）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已经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中国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的虚无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

藤井先生的这一重要发现，为中日两国的鲁迅研究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史料，它对于探讨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期的文学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同时也着实证明，日本对于鲁迅文学活动的介绍，是早于中国的，这比 1913 年 4 月恽铁樵在《小说月报》四卷一号上对鲁迅的文言“小说《怀旧》所做的十处随文评点和‘焦木附志’”的评论^①要早四年，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介绍鲁迅的文字，至少在我们还没有能够发现新的史料来更新这一结论之前是这样。

2. 五四之后：青木正儿和《支那学》

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三年之后，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开始

^① 张梦阳：《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I》，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年 10 月，第 2 页。

注意到已经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上的中国新文学与鲁迅，这个人就是青木正儿。

青木正儿(1887~1964)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曾师事桃李满天下的京都帝大教授狩野直喜(中国文学研究家)，与王国维、鲁迅在不同时期都有过业务上的联系。1919年前后，他到中国游学，在北京，亲身感受到五四文学革命的热烈气氛。归国后，曾在同志社、立命馆等大学任教。1920年9月，青木正儿等人发起创刊专门介绍中国文学问题的月刊《支那学》，由支那学社编辑，东京弘文堂书店刊行，1947年停刊。

1920年9月至11月，青木正儿在他主编的《支那学》1~3期上，发表了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文章《以胡适为中心的潮涌浪旋着的文学革命》。这篇文章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新文学的革新意义，其中虽然有从形式上看问题的倾向，把胡适视为文学革命运动的中心人物，但也涉及其他作家，对他们作了较公正的评价。譬如在第2期里，他谈到了白话新诗：“现在一个新的事实是，有了白话诗的同行，刘半农、沈尹默、唐俟等也踊跃参加。这些人中，胡适稍有癖好，即以闪现西学的新知识而辟新味；沈则可以看出站在本国的立场而努力摆脱旧习，但往往因了古人而踏入旧诗的意境中；刘是最有新式文人气质的，却往往难免遭人议为肤浅；唐则诗味淡薄，未能入境，就象扒拉茶泡饭一样，往坏了说是索然无味。”^①这样的评价，也都是切中肯綮的，尽管对唐俟(鲁迅)的白话诗评价不高。青木正儿当时是否知道这“唐俟”便是鲁迅的另一笔名不得而知。但平心而论，鲁迅在五四初期尝试创作的白话新诗，虽然思想意义无可非议，艺术表现方面却不免乏味。旧体诗创作，鲁迅虽然擅长，但由于深知唐诗的高峰，后人难以跨越，所以也是浅尝辄止。鲁迅的睿智的表现不在歌诗而在小说和杂文方面。青木正儿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第3期的这篇文章里，就对鲁迅的小说作出了很公正的评价。他说：“在戏剧小说方面，并无更令人注目的作品。翻译方面，周作人作为近代大陆文学介绍者在辛勤劳作，译笔不拘于旧文明而直译，似一味尽力追

^① 大正9年(1920年)10月《支那学》第1卷第2号，第43页。

求原文韵味。小说方面，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个迫害狂的人的恐怖的幻觉，达到了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尚未达到的境地。”^①青木正儿这篇文章的脱稿日期是1920年10月10日，那时假定他读了鲁迅的全部小说，也不过是《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和《一件小事》。但他却能独具慧眼，看到“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这是很难得的。应该说，青木正儿不仅是最早向日本介绍中国新文学的日本人，而且也是最早发现鲁迅价值的日本人。

3. 丸山昏迷、清水安三与鲁迅

丸山昏迷（1894～1924）同鲁迅的交往一度很是频繁，仅据《鲁迅日记》记载，就有18次之多。最早一次是1923年1月7日：“下午丸山君来，并介绍一记者橘君名朴”，其后有一起赴宴的记载。同年1月20日，“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4月15日，“午丸山招饮，与爱罗及二弟同往中央饭店”；5月8日，“晚丸山招饮于大陆饭店，同座又有石川及藤原镰兄二人”。互赠书刊又有记载。9月1日，“下午以《呐喊》各一册寄丸山及胡适之”；11月14日，“丸山来并持交藤冢教授所赠《通俗忠义水浒传》并《拾遗》一部八十本”。后来又记下一些书信往来。

丸山昏迷与鲁迅的密切交往，是和他在《北京周报》^②上致力于介绍中国五四新文学有着紧密联系的。早在丸山昏迷的名字在《鲁迅日记》中出现之前，《北京周报》就在他的努力下，从1921年6月4日第19期上，

① 大正9年（1920年）11月《支那学》第1卷第3号，第43～44页。

② 《北京周报》是日本人藤原镰兄创办和编辑的。藤原镰兄在1911年到了北京，先在1912年3月创办了《周刊新支那》（《新中国周刊》），1913年9月创办了《日刊新支那》（《新中国日报》），前后达十年之久。1921年他离开新支那社，独立创办了极东新信社，从1921年1月起，开始创办《北京周报》，自任主编兼发行人，直到1927年11月为止。此后《北京周报》由燕尘社接办，直到1930年9月为止，共出版了418期。当藤原镰兄主编《新支那》和《北京周报》时，丸山昏迷曾任这两个刊物的记者。丸山昏迷原名丸山幸一郎，又名昏迷生，1919年来到北京。他的思想相当进步，同北京的文化教育界人士都有广泛的联系，1924年8月返国，因病于9月逝世。参见戈宝权：《鲁迅的著作在日本》，《鲁迅研究（1）》，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第93～94页。

开始介绍中国新文学作家和作品了。第一篇小说就是鲁迅的《孔乙己》，译者为仲密(周作人)。1923年1月出版的第47期上，又发表了鲁迅的《兔和猫》，译者署同人(鲁迅)；4月1日出版的第59期上，又掲載了丸山昏迷以昏迷生的笔名写的《周树人氏》一文。文章指出：“在中国……写作劝善小说、家庭小说的人很多，但是创作称得上是作品的人却几乎没有。在现代中国，鲁迅的小说，无论是在文章的艺术魅力方面，还是在文章的洗练简洁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其他许多作家。鲁迅用创作的笔，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等颇得好评的文章。他是作家，同时也是改革家，他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改革情绪，《孔乙己》就是一例。他批评许多中国人那种一味地憧憬中国过去的态度，以为那是一钱不值的。”^①也许正是由于丸山昏迷在《北京周报》上致力于介绍五四新文学，才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并开始和他频繁往来。

清水安三(1891~1988)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美国俄亥俄州樱美林大学神学部毕业。1917年6月以牧师身份来到中国，先在满洲奉天(沈阳)经营儿童乐园，1919年1月去北京，翌年创办崇贞女子工读学校。他侨居中国30年，直到日本战败后1946年3月才返回日本，同年5月又在东京都创办了樱美林高等女子学校，后来发展为樱美林大学并任校长。清水安三民主主义思想浓厚，他曾耳濡目染了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寄予同情。那时针对五四运动中出现的排日、反日情绪，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曾开会要求日本政府派军队来保卫，当时会场上唯一站起来公开表示反对意见的是清水安三，致使有人立即提出“紧急动议”：调查发言人的国籍是否是日本人。^②

清水安三与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都有过密切的往来，他在自己的文章当中也对上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都做了充分的肯定，与鲁迅的关系尤为密切。前文所引1923年1月20日《鲁迅日记》所记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招饮”一事，清水也在列。其实，1921年爱罗先

① 转引自张杰：《域外的接近与接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37页。

② 参见清水安三：《北京清谭——中国体验》，日本教育出版株式会社，1975年6月，第121~122页。

珂被逐出日本，由《我们》杂志编辑主任福冈诚一陪同来到北京后，就寄寓在八道湾的鲁迅家中。福冈诚一回国后，清水安三便常去周宅，笔录爱罗先珂口述的童话，然后发往东京的杂志社。据清水安三自己讲：鲁迅有时也托他笔录，常常说“‘清水君，能不能也给我笔录一下？’于是，我给爱罗先珂笔录完后，就去西厢房记下鲁迅的口述。鲁迅的作品中，有先用日文写成，后来又译成中文的，那大体上是我笔录的。”^①可见清水安三与鲁迅的关系之深。

据已故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丸山昇的研究：清水安三在他1924年出版的《支那新人和黎明运动》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鲁迅的小说创作。丸山指出：“在日本国内，这恐怕是仅次于青木正儿的评论了。”文章先引述了爱罗先珂的话“今天的中国总算出现的一位创作家”以及胡适所说的“用白话创作，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接着介绍了《孔乙己》和《白光》的梗概，然后指出：“描写是自然主义的，并力求加以若干讽刺。《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都是好作品。”^②这样的评介，对于一向热衷于中国古典文学而轻视五四新文学的日本学界来说，不啻看到了一缕新的曙光。

4. 革命文学论争对日本鲁迅评论的影响

左翼文学十年时期，日本对鲁迅的研究介绍，一时间形成一种大的趋势，翻译评价之多，是盛况空前的。人们开始认识到，离开了鲁迅，将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的新兴文学。鲁迅作为“文坛泰斗”，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袖”的地位，也开始为日本文坛所首肯。当然，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并不是所有的鲁迅研究介绍者都是这样，而是经历了一段偏见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之后，一些有识之士才提出来的。

鲁迅的作品，最早被翻译成日文并在日本国内杂志上发表的是《故

^① 清水安三：《北京清谭——中国体验》，日本教育出版株式会社，1975年6月，第92页。

^② 参见《日本的鲁迅研究》（拙译），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324页。

乡》。1927年10月，它被刊登在日本白桦派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主编的杂志《大调和》上。这一期《大调和》是《亚洲文化研究号》，对于《故乡》的作者鲁迅，编者只是简要地介绍他是“民国第一流的短篇作家”，这似乎仅仅是从文学的角度给予评价的，其他方面则知之甚少。尽管如此，这样的评价本身也还没有多少偏见。也诚如丸山昇先生所言：“武者小路编辑的杂志刊载这样的内容，本身便显示出对国民革命这一政治性剧变的关心，由此，日本文化界也终于感应到了中国的新气息。”^①

1928年，中国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这场论争对于促进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在论争中也明显地暴露出年轻的革命作家们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而这种思想表现，不能不说是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有着渊源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在两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内部，都有“左”的思想基础。而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是深受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某些影响的，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②但反过来，受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影响很深的创造社、太阳社诸作家对于鲁迅的批评，又严重地影响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阵营甚至这个阵营之外的人士，使他们一开始就对鲁迅的评论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错误。

1928年7月，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成员藤枝丈夫在《战旗》上发表《中国的新兴文艺运动》，11月在《国际文化》上发表《中国的左翼出版物》等文章。文章虽然热情地介绍了正在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但对鲁迅的介绍评价却出现了失误，如在后一篇文章中说：“对于以《语丝》、《北新》月刊为基地，经常发表一些反革命谰言的鲁迅一派，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之所以出现这种失误，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阵营中的某些人有“左”的倾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不能认识鲁迅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受到了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围攻鲁迅的影响，而把鲁迅看成是反对革命文学的作家。譬如在《中国的新

① 《日本的鲁迅研究》（拙译），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326页。

② 参见刘柏青：《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影响》，《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

兴文艺运动》一文里，藤枝丈夫谈到他会见成仿吾与郭沫若时，郭沫若（在文章里称为k）曾说这样的话：“现在主要是对旧文学的清算。鲁迅、张资平等人受到了严正的批判。……在日本这类事情不大好判断，请广为介绍一下。”很显然，藤枝丈夫是受到了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的影响。

应当指出，像藤枝丈夫这样贬低鲁迅的看法，一时之间在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阵营中并非个别现象，总之是把郭沫若看成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代表，而把鲁迅看成反革命文学的旧文人。

同样的思想倾向，在无产阶级文艺阵营以外的人中也存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研究中国问题佼佼者的铃江言一，1929年11月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其中有关文学革命的章节，对于鲁迅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错误。文章的大意是：能显示中国从五四运动兴起的文学革命思想倾向的，是鲁迅的《呐喊》。那时的革命思想主要是反封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势力。鲁迅当时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他的作品多是描写贫民的生活，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其中没有任何的阶级立场。这一时代在文学史上被称之为“阿Q时代”。1924年顷，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增，革命走向高潮，但鲁迅的作品却依然停留在感伤主义的阶段，不问经济的背景，只是从人类的一般弱点对封建社会加以攻击。所以，此时鲁迅一派作家的创作，已渐趋没落。^①从这篇文章的观点来看，显然与中国太阳社批评家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的思想倾向没有多少差别，而其中所说的文学史上称之为“阿Q时代”，又明显地是钱杏邨评价鲁迅《阿Q正传》的用语。

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发表在1928年3月号的《太阳月刊》上，后收入同年7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里。据日本学者的研究，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观点，曾受到过藏原惟人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②铃江言一是否读过

① 铃江言一：《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1929年11月满铁调查资料第109编。1953年9月改题为《中国解放斗争史》，石崎书店出版。

② 参见芦田肇：《钱杏邨的“新写实主义”——与藏原惟人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有关问题之考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

钱杏邨的这篇文章不得而知，但他写《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中的有关文学革命的章节时，很可能参阅过钱杏邨的这篇文章。此外，确有参阅过钱杏邨的这篇文章并受其影响的人。1931年1月《满蒙》12卷1期开始连载长江阳译的《阿Q正传》，大概为了配合译文的发表，这一期《满蒙》上还有大内隆雄的专文《鲁迅和他的时代》。文章说：“凡通读过《呐喊》、《彷徨》和《野草》的人，从那里是看不到革命出路的；只有作者在那里呐喊和彷徨，他终于只是野草，而未能成为乔木；他只说了过去和现在，而没有将来。鲁迅在那里暴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小资产阶级的任性、不承认错误及其疑虑，我们都能看出这些问题的所在。即使面前有一条光明路，他也不会走向那里，而且不安于现实，理想中也缺少希望，结果是唯有在歧路上徘徊。”这几乎是直接挪用了钱杏邨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作者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附白，略谓本稿许多材料是参考了钱杏邨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可见这篇文章是直接受到了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影响的。

类似的思想倾向，在《满蒙》的另一作家大高岩的文章也可以见到。1932年9月，《满蒙》13卷9期上刊登了大高岩的文章《鲁迅再吟味》。文章说：“作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品，第一可以举出鲁迅的名字。《阿Q正传》、《呐喊》和《彷徨》是他的力作。在鲁迅等人的作品中，以辛辣的笔调鞭笞了老朽的封建的遗物。有名的《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正是这个阶级的废物。”“然而欧洲大战以后……新兴的知识分子妥协屈服于资本主义并国内的封建势力也不是例外之事。这样的社会形势，在文坛内部也有反映，胡适、周作人、鲁迅等逐渐官僚化了。”“鲁迅后来转向左翼，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将资产阶级文学从文坛上彻底击溃。”将鲁迅认作“自然主义作家”的看法，是1924年以来以创造社的成仿吾为中心展开的。时至1932年，我们在大高岩的文章里，仍然看到了创造社的影响。

5. 原野昌一郎的另类鲁迅观

但是，《满蒙》的另一作者对鲁迅则有不同的看法。1931年5月，原

野昌一郎在《满蒙》12卷5期上发表《中国新兴文艺和鲁迅》，如标题所示，鲁迅已和新兴文艺挂上钩了。原野昌一郎虽然同意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中的意见，但他不赞成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而能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封建主义长期统治造成人们特殊的心理结构这样的角度，来评价鲁迅及其作品的价值。文章说：“作为文化国家的中国，作为哲学家的中国人，拥有在东洋乃至世界都值得夸耀的广博的心灵的著作，或曰具有无限迷蒙的古典作品。……因此其出现各种文学形态也是理所当然，但最为准确地表现给现代的我们的则是鲁迅。”“不用说，中国是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传统馨香的老大国家，千百年来，其东方性的广泛的文化和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祸乱、重压，在不断地经历着跌倒再起的轮回；百官的横恣，民众的被压迫，实在是带着无与伦比的冷酷性反复着。……我们翻开一页历史，即可看到这痛烈的现实。虽然封建专制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但达到这般惨烈程度的地方还有吗？如此看来，他们一方面看上去怯懦、残忍，一方面又有着近乎顽固的勤劳、天命观、乡党间的团结等等，这是有充分的必然性的。”“短篇《孔乙己》中的孔乙己，《风波》的七斤，《阿Q正传》的阿Q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形象。……特别是我们最关心和称赞的是，他的主题，几乎全都在于将在最底层呻吟的民众的姿态，写实而精确地显现在我们面前。是赤裸裸地暴露占中国民众多半的乡下人的作品。”原野昌一郎在成仿吾和钱杏邨二人中赞成成仿吾：“总之，他是从相当广泛的认识（一方面是艺术的，一方面是哲学的）出发来评论的，这一点与钱杏邨的社会性的排他主义的评论不同。……真正的批评，应该尽量避免片面而具有包容的（既形而上又形而下）普遍性，并且必须兼具局部的渗透性，这便是为何批评如此之难。我似乎在成仿吾身上感到了某种暗示。”

可见他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这一评价，已经从创造社否定鲁迅的框架中突破出来了。这种从民族风俗、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评价中国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态度，在日本也不失为理解中国新兴文学的一种类型。

6. 山上正义、尾崎秀实与鲁迅

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林守仁对鲁迅的评价。林守仁是山上正义的笔名，他是日本的进步人士，曾在初期《播种人》上发表过俳句，1921年底因散发反战传单的“晓民共产党事件”而下过狱，被监禁过八个月，出狱后来过中国，1926年又以特派新闻记者的身份来中国访问，到广州并结识了鲁迅，此后开始与鲁迅交往。1929年又来上海，仍然与鲁迅保持着友好的往来。1928年他写了《谈鲁迅——北支那的白话文学运动》一文，发表在1928年3月《新潮》25卷3期上。文中虽有一些看法不够妥当，但对鲁迅十分推崇，明确指出了鲁迅在革命文学运动中的领袖地位，这是和一些左翼人士的看法不相同的。文章说：“陈独秀和胡适尽管提出了白话文学宣言，但前者忽即转入社会运动，后者则追逐当代的声誉，投进教育界，都走出文学圈子外边去了。之后，鲁迅却忠实地把它担负起来，勇敢而顽强地引导其潮流直至今日。”^①肯定了鲁迅在文学革命中的成绩和领袖作用。这种真知灼见，在当时的日本是极为可贵的，它会使日本左翼文艺阵营耳目为之一新，也会促使他们重新评价鲁迅。

山上正义还积极参与了鲁迅作品的翻译。

1931年1月，《满蒙》12卷1期开始连载长江阳译的《阿Q正传》。这一年秋，继井上红梅、长江阳的译本之后，又有两种《阿Q正传》的新译本出版，译者为松浦圭三和林守仁。松浦圭三的译本9月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小说集》的第一编由白扬社出版，其中还包括《孔乙己》和《狂人日记》；书前有译者序，并附有《关于〈阿Q正传〉的各家评语》、《作者作品目录》和《作者传略》。林守仁的译本收在《国际无产阶级丛书》中，10月由四六书院出版。尾崎秀实以白川次郎的笔名为该书写了序言《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林守仁也写了译者序言《关于鲁迅及其作品》。

林守仁在翻译《阿Q正传》的过程中得到过鲁迅的热情帮助，鲁迅

^① 山上正义：《谈鲁迅》（李芒译，无副标题），《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第181页。

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已成为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佳话。值得注意的是收有林译《阿Q正传》的“国际无产阶级丛书”中有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介绍鲁迅的文章。尾崎秀实是日本的革命作家，他曾作为特派记者到过上海，经史沫特莱介绍与鲁迅相识，十分友善，对鲁迅有较深的了解。他在这篇序言中全面介绍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现状，谈到鲁迅，则评论说：“鲁迅不但是声名卓著的作家，而且自从他成为自由大同盟的领导之后，他的活动更值得钦佩。诚如大家所知道的，他是左联的泰斗，至今还在果断地参加着战斗。”而山上正义的序言则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的最唯一代表者，就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来说，今天也依然是当前文坛的泰斗。”^①同时，山上正义还在序言中引用美国《新群众》评论鲁迅的话，说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

总之，随着松浦圭三和山上正义的两种《阿Q正传》译本的出版而出现的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对鲁迅的评论文章，说明了日本左翼文学家和进步人士对鲁迅的评价有了转变。鲁迅作为革命作家，作为左翼文坛泰斗的地位，在日本也已被承认。

7. 佐藤春夫与鲁迅

逐渐地，鲁迅的文学地位开始为左翼文学阵营之外的日本作家所推崇。1932年1月，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翻译了鲁迅的小说《故乡》，发表在日本著名刊物《中央公论》上，并附有《关于原作者小记》，给鲁迅以很高的评价。顺便提一下，这一年4月的《改造》杂志上，还登载了《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者增田涉写的《鲁迅传》，这应该是中外所见最早的鲁迅传吧。

佐藤春夫译的《故乡》，是日本杂志上发表的《故乡》的第二种译本，他介绍评价鲁迅的文字，也是继山上正义以来最重要的文章。在《关于

^① 林守仁：《关于鲁迅及其作品》（戈宝权译），《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第192页。

原作者小记》里，他介绍了鲁迅的简历，谈到鲁迅由于作《中国小说史略》而成为被人推重的学者之后，说：“在他的作品中，的确具有很深的传统意味。他从学者蝉蜕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面诱掖指导建设新文学的运动，一面自身也从事新文学的创作。……1921年终于有一代杰作《阿Q正传》的问世。其他作品短篇中篇三十种，都使他名闻天下。创作之外，也不怠慢日德俄等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经过不断地努力，终于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之父，完全尽到了责任。……他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全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而且还因罗曼·罗兰的介绍而名噪法国。之后，其作品有法德俄英美及世界语译本，鲁迅是世界的。”^①佐藤春夫对鲁迅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能突破自己所处文学地位的囿见，承认鲁迅在中国左翼文坛的领袖地位，实在难得。尤其在鲁迅的作品中发掘出了“很深的传统意味”，这看法更是与众不同。

1936年10月19日，佐藤春夫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后，当夜写下了悼念鲁迅的文章——《月光与少年——鲁迅的艺术》，发表在10月21日《中外商业新闻》上。文章辞情切切，开篇便道：“我与鲁迅一面之识也没有。偶尔与这位世上不再容易出现的伟大的东洋的文学者生于同一时代而终又永久失去了相会之期，这不能说不是—件恨事，永生的恨事。”^②

8. 欣慰的纪念

1936年10月19日晨，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病逝。消息传到日本，引起日本文化界的极大震动，一时间日本的友好人士，分担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悲痛。日本的许多报刊迅速作出反应，纷纷发表悼念鲁迅的文章。从鲁迅逝世的次日起，到1938年8月改造社《大鲁迅全集》七卷本出齐时，这期间日本报刊发表纪念、研究鲁迅的文章和鲁迅作品的翻译，据不完全统计已超过140余篇。特别是《大鲁迅全集》的出版，虽说只

① 转译自《座谈会·佐藤春夫と中国》，丸山昇、祖父江昭二、伊藤虎丸编：《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汲古书院，1986年12月，第601～602页。

② 佐藤春夫：《月光与少年》（韦特孚译），《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上海书店复印，1979年12月，第31～32页。